

审时度势 郭良平

可治理性是时代最大挑战

世界正进入一个泛抗议的时代。各种抗议浪潮此起彼伏，诉求五花八门，方式花样不断翻新，极端化和暴力倾向不断加剧，每每使当局束手无策，可治理性正成为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。

香港持续六个多月之久的暴力抗争，这次似乎走在这个新时代的前列，为世界各地抗议运动纷纷效法。如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示威者向香港学习“和你飞”“和你塞”的堵塞机场行动；智利圣地亚哥抗议地铁加价的人受到香港的启发，开始“装修”（打砸烧）地铁；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的学生，在反对修改一个有关反腐机构的法律的抗议中，印发香港的经验的手册，学习怎样对付催泪弹和网上筹资；法国正在发生的反对退休金改革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，其骚乱、打砸焚烧车辆致交通瘫痪，和香港如出一辙。

本世纪以来陆续发生了阿拉伯之春，占领华尔街、黄背心运动、气候变迁抗议，反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达沃斯论坛的年度抗议，左右翼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，反移民和全球化以及蔓延全球的Me Too运动等等，当然还有分裂主义、宗教原教旨极端主义、恐怖主义。

这些抗议运动往往是自发的，缺乏一致诉求、统一组织和公认的领袖人物，它们通过社交平台和加密通讯软件进行协调。参与者自发选择自己感兴趣和信任的群组作为信息来源，自主判断自己在社运中的角色和行为。有的走上街头与警察对峙，有的负责网络舆论宣传，有的负责争取国际援助，寻求外部力量的参与，从信息发布到物资供应，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辅导一应俱全。示威者既争议，又合作，但抗争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。

可治理性危机的根源有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全球化大大扩展了一般人的眼界，使他们的价值观、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多元化，加剧了种族、宗教冲突和利益矛盾，导致各种诉求大幅度增加，并多元化，分散化，不同诉求小群体不得不结伴抗议以扩大影响。他们有共同的抗议对象却没有一致的主张，甚至主张相互冲突。

没有共同的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抗议者中谁也代表不了谁，谁也不服谁，因而提不出共同的解决方案，当局想达成妥协也找不到谈判代表。有许多人，包括年轻人和失业工人，往往搞不清他们愤怒和挫折感的来源是什么，提不出或提错了解决方案。自发、无组织、无领袖的示威抗议活动能宣泄，但基本无解，而无解的抗争很容易走向暴力。年轻人追求痛快、刺激和燃烧的青春，而破坏的成本由全社会分摊。

第二，现代社会的力量的分配向个人和下层倾斜：表达诉求的机会和形式大幅度增加，抗争的成本下降。城市化打破原有的有机社会，形成汪洋大海一般的大众社会。社交媒体大大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和风险，也使香港式的“向水一样”（be water）、无领袖和协调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可能。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网络的普及，将越来越多

可造成大规模破坏和杀伤的手段掌握在个人手中。

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者使用的自制炸弹、毒品、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的制造技术，都可以在网上搜到。1995年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白人“独狼”恐怖分子，用化肥自制的卡车炸弹炸毁了一个政府办公大楼，造成包括一个幼儿园的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员死亡。九一一恐怖分子事先周密部署，用拆纸盒刀这样的简单工具，就能劫持四架加满油的民航机来实施恐怖袭击，改变了世界历史。

第三，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是根本制度和全球化造成的，因而基本无解，如金融风暴、贫富差距、经济不景气、产业链布局、失业、物价上涨、气候变化、跨境污染和环境退化、水资源的分配、毒品泛滥、贫富差距和无家可归现象，中产阶层的困境等等，都不是任何单个国家的政府能解决的，而国际合作治理的机制严重不足。这些都会不断在社会中积累怨气、戾气，很小一点事情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社会运动，如突尼斯的一个小贩自焚导致了“阿拉伯之春”。

躁动世界变得非常难治理

以上三个因素交织使这个躁动的世界变得非常难治理，民主国家尤其如此：在社会撕裂的情况下，民主选举非但不能达成妥协、化解矛盾，反而成了党派互掐、激化矛盾的战场。昂贵的竞选费用扩大了金钱的影响，使大众民主重新向精英民主回归，政府的公信力屡创历史新低。

自由主义理念和制度使抗议示威活动有很大的空间，但矛盾难以调和、问题的无解和由此积累起来的怒火，使抗议示威活动很容易超越法律、走向极端甚至暴力。为了讨好选民，执政党往往对违法行为网开一面，姑息纵容暴力破坏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种形势类似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描述的丛林世界，急需一个利维坦（Leviathan）国度的出现。在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后，世界形势似乎正在向有利于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，近些年各国政治强人频现的根源就在于此。

但这必须是良治的威权主义，而不仅仅是高压——高压没能避免“阿拉伯之春”。这方面中国有巨大的优势。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就为中共定下了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国策，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经验教训。

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在应付社会动乱这方面的准备最充足：数亿监控摄像头遍布神州大地，人脸识别技术领先世界，当局可以监控每一个人的手机和通讯；所有大数据库都为政府掌控，并被用于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；政法、国安、武警、网警、公安、协警、治安联防等加起来，人数恐怕上千万；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，非政府组织受到严格限制和监控，异议分子屁股后都跟着安全部门派来的尾巴；执政党有庞大的宣传机器，掌控着所有的大众媒体和出版发行业，严密监视着社交媒体；超出法律的维稳行动屡见不鲜，公民社会受到打压，执政党的党员和组织遍布各个角落。

充满理想的剑桥高材生，而且当天还企图感化那个被提前释放、对他们挥刀相向的恐怖分子。

面对这些挑战，偏执的理想主义和迂腐的政治正确使这些国家束手无策。可以预料的是，不管西方国家口头上唱什么高调，最终都不得不悄悄采用中国的许多手段、方法和制度，因为在大抗议时代，它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相通、相同的。

自由主义的理想很好，价值观也被普遍接受，但在治理制度和能力上却千疮百孔；各党派在竞选中所无不用其极，在决策上互相否决，在它们的激烈撕打中政府往往陷于瘫痪。这同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极不适应，是西方国家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中国取得的成就表明威权主义可以用来做好事，中国的体制有强大的能力来应对这个正在出现的“乱世”。但这并不等于西方人看到的“邪恶”不存在。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来看，中国仍没有跳出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讨论的历史周期律。中共面临的课题，是怎么做到这么庞大严密的国家机器不会成为少数权势人物、利益集团用来谋私和排斥异己的工具，做到公器公用，维护社会正义，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和对未来的信心。

利维坦要有震慑力，更必须是正义的化身。通过近些年来大规模、持续不断的反腐和制度建设，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。但挑战是如何能够使“正态”长期持续下去，有永久性的制度、文化和社会风气的保障，而不是依靠百年难逢的“好皇帝”和青天大老爷。这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，包括民国时期都没能解决的难题。很显然，中国传统中缺乏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素，必须采他山之石以求突破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